

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



杜维运 著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

杜维运 著

商务印书馆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杜维运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12
ISBN 978 - 7 - 100 - 07482 - 7

I. ①中… II. ①杜… III. ①史学—对比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IV. ①K207②K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030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
杜维运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7482 - 7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8 页

定价: 22.00 元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引论	(3)
第二章 西方对中国史学的认识	(9)
第三章 中国文化中的历史观念与史学的绵延发展	(50)
第四章 中国的史官记事制度与修史事业	(73)
(一)中国的史官记事制度	(73)
(二)中国的修史事业	(83)
第五章 中国史学的精细、详赡与博大	(100)
(一)中国史学的精细与详赡	(101)
(二)中国史学的博大	(111)
第六章 中国史学中的记实与求真	(120)
(一)记实	(121)
(二)求真	(126)
第七章 中国史学中的思想、理论与方法	(147)
(一)史学思想	(147)

2 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

1. 经世思想	(148)
2. 和平思想	(150)
3. 会通思想	(153)
(二) 史学理论	(155)
1. 疾虚妄	(156)
2. “史才三长”论	(161)
3. “史德”说	(163)
(三) 史学方法	(165)
1. 比较方法	(166)
2. 归纳方法	(169)
3. 参伍错综以求其是的方法	(171)
第八章 中国史学与人类文明史	(178)
第九章 中国史学的缺陷与所应西学于西方者	(190)
(一) 概说	(190)
(二) 中国史学的缺陷	(191)
1. 神圣独立的史官中,非无曲笔逢迎者	(191)
2. 集众官修的正史,每见繁芜、陋劣之作	(191)
3. 纪传体例,能现历史万象,而有见树不见林之弊	(192)
4. 宋以后流行的史论,不能与西方的历史解释相比拟	(193)
5. 西方汉学家的评论	(194)
(三) 中国所应西学于西方者	(196)
1. 兼采西方史学体例	(196)
2. 融合西方史学方法	(196)
3. 会通西方史学理论	(196)
第十章 比较史学与世界史学的建立	(201)
(一) 兰克史学的冠冕地位及陷于危机	(201)

(二)比较史学的魔杖神力 ——以中国史学济西方史学之穷	(203)
(三)世界史学的建立	(207)
第十一章 世界新史学的展望	(213)
(一)建立及时记载天下事的制度	(213)
(二)扩展辽阔的世界史学视野	(214)
(三)撰写全人类的历史	(215)
(四)维护历史神圣独立的尊严	(216)
(五)发扬历史客观、公正的精神	(216)
(六)冶中西求真的史学方法于一炉	(217)
(七)发展叙事、解释、分析、综合的艺术	(218)
(八)培养史学家的优美气质	(219)
(九)正视新史料的丛出与新技术的训练	(219)
1. 新史料的丛出	(219)
2. 新技术的训练	(220)
第十二章 结 语	(223)
参考书目	(227)

序 言

1952年当我从台湾大学外文系转到历史系时，就立下志愿，研究中国史学史，从清代始，向上逆溯。1962年负笈英伦，侧身剑桥大学，与西方世界相接，了解西方史学的兴趣骤增，于是倾力阅读西方论史学之书，如醉如痴，迄于1964年回国，阅读约数十册，初见西方史学的美富，无限欢欣。惟在阅读之际，偶然遇到西方史家论及中国史学处，觉其议论有极精当者，亦有甚值商榷者，于是草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一书，于1966年出版。此后继续钻研西方史学，所见及西方论中国史学的言论益多，乃于1978年至1980年之间，改写《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一书，字数增至一倍以上，学林许其有沟通中西史学之功，然自我评论，则觉不足。西方史学，浩瀚无涯，中国史学，自己所认识者，亦未至彻底。因此从1981年起，一方面继续深入了解西方史学，一方面计划撰写一部全面性的中国史学史，以扩大对中国史学的认识。2004年三卷本的《中国史学史》写成，字数近八十万言，中国史学的大脉络、大建树涌现，亦于关键处与西方史学相比较，所得的新认识，与以前迥异者，为中国史学的世界地位，有不亚于西方史学者。西方史学，论述精辟，方法新颖，分析细微，组织周密，中国史学，落于其后。然中国史学有数千年史官记事不绝的传统，大量直接的史料存留下来，世界万国，皆无此制度；中国设立史馆修史的制度，为中国留下最详实

2 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

的一部正史，举世无此史学遗产；中国自上古时代起，即出现了世界史的观念；中国史学的和平思想、人文精神，弥漫于史籍之中；中国史学，记实、求真，传统悠久；中国史学，精细、详赡、博大，甲于全球；中国史学亦汲汲以人类文明史为旨归。凡此，都是中国史学的世界价值，可济西方史学之穷，而为世界新史学辟新猷。在此观念下，遂决计新写《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一书，以宏扬中国史学于世界。非局限于本位主义，只望中国史学能为世界正视而已。

苹果能否与橘子放在一起作比较，是西方反对比较史学的理由，然而站在水果的大范围内，二者是可以互作比较的。其所采用的方法，则与一般的研究不同。一般多采用原创研究（original research）的方法，自原始资料，深入细致地研究。比较史学则以所涉广阔，一一作原创研究，势所不及。于是不得不采用综合研究（synthetic research）的方法，博采中外的论述，济以个人的研究，期于到达新创的境界。集众腋以成轻裘，比较史学乃大。

拙著综合了中外学者的论见，也综合了个人以前的研究。近六十年沉淫于史学之中，凡遇到中外学者讨论史学的言论，皆割记别纸。其精当者，置于座右；其待商榷者，亦存留之，期于参伍错综以求其是。个人的研究，《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一书，是初步比较中西史学的异同优劣；《中国史学史》一书，系自原始史学资料，归纳分析，以见中国史学的世界价值；《史学方法论》一书，目的则在融合中西史学方法于一炉。三者作了本书的前驱。借综合以创新，是作者的微愿。

在麦当劳、星巴克遍布世界的今天，中国史学进入世界之林，应为顺应潮流。是书之作，或不容已。惟幸海内外博雅君子有以教之。

第一章 引 论

茫茫宇宙之中，被希腊诗人形容为最神妙的人类^①，出现于其间，是极富诗情画意的。宇宙初开，浑浑噩噩，万物共生，人类生于其间，可能历时已数十万年或百万年以上。“草木榛榛，鹿豕狃狃，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②洪荒时代，人类能生存，像是意外。近代考古人类学家从地下发掘出来的石器，说明原始人类以石器取食及自卫的情况。处于洪水横流、禽兽逼人^③的环境，人类历尽艰辛以生存，写成历史，必然精彩。惜其时文字未创，书简阙如，曲折过程，尽变虚无。“万古飞鸟过”，百万年岁月，遂如一瞬间过去了。

四五千年前，人类发明了文字，人类真正的文明，自此开始。用文字记事，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盛事。人类的生活情形，演化状态，所创造的优美文化，所掀起的惊心动魄事件，一一记载，人类近五千年遂尽现绚丽、生动、变幻、扰攘的新页。百万年漆黑，五千年光辉闪耀，历史的珍贵，谁能否认？

历史怎样写成？写历史的史学家，所采用的方法，是否客观严谨？所保持的态度，是否公正超然？其思想与观点，所发生的影响如何？其写成的内容，周密可靠的程度如何？这一些，又涉及所谓史学的问题了。所谓史学，西方相对的名词是 *historiography*，犹如历

4 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

史与 history 相对。历史事件发生了，当时或稍后被记录下来，这是原始的历史记录，也就是所谓原始的史料。这些历史记录是史学家据以写成历史的基本。史学家批评其真实程度，运用独特的思想与方法，参伍错综各方面的证据，写成体大思精的历史巨著，一套历史著述的史学，于是就展现了。至于历史如何发展，其轨迹是否可寻？其意义是否可见？决定历史发展的因素是什么？历史的远景怎样呈现？讨论这类问题，就是另外一套历史发展的史学了。孔子写《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是历史著述方面的史学；孟子“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④之说，是历史发展方面的史学。史学，史学，如此界定，应属适当。

世界上出现的民族，不是都有兴趣记录往事。有些民族，永远无意于知其过去。他们有时为视发生于过去的事件若泡沫的哲学或宗教所支配，看一切像在风中飞舞的枯叶，了无意义。有些民族像是离说神话故事的阶段不远^⑤。两个大的例外，是中华民族与西方民族。中华民族在上古时代文字发明的伊始，就已有兴趣记录往事了。西方可溯至古典的希腊，远一点可溯至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也已有了记录往事的事实。记录往事是史学出现的前驱。大约记录往事的传统延续到相当时期以后，而史学出现。人类的历史时期，长不过五千年，人类的史学时期，不超越三千年。有些民族与地区，甚至从与史学无缘^⑥。从悠久的历史，蔚为绵延不绝的史学，在人类文化史上，是极为值得珍视的一种发展。这种值得珍视的发展，也最能从中国与西方世界看到。

中国自上古以来，史学赓续发展，两千余年，未尝一日中绝。其盈积的历史记录，可以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一类的名词来形容；其写成的历史，从通史到断代史，具体、详赡，创世界未有的记录；批评史料、讨论史学的专书，出现于 8 世纪，像是史学的奇迹。凡

此，都说明中国史学的卓越成就。其余力复开辟了邻近国家日本、韩国、越南的史学^⑦。

西方世界自希腊、罗马时代起，史学即现夺目光彩，中间虽有将近一千年的史学黑暗时期，然自文艺复兴以后，史学继续发展，浸假至19世纪而出现史学黄金时期（the golden age of historiography），大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所倡导的科学史学，风靡寰宇，举世史学，皆俯首于西方史学之下。形势所趋，如飘风，如骤雨，莫可遏止。以中国方面而言，自19世纪末叶西方史学输入中国以后，史学界倾慕西方史学，如醉如痴，而痛斥中国史学之声，则不绝于耳。如徐仁铸云：

“西人之史，皆记国政及民间事，故读者可考其世焉。中国正史，仅记一姓所以经营天下保守疆土之术，及其臣仆翼戴褒荣之陈迹，而民间之事，悉置不记载。然则不过十七姓家谱耳，安得谓之史哉？”^⑧

这是批评中国历史为帝王家谱而不记载民事。声誉满全国的梁启超亦云：

“试一繙四库之书，其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者，非史学书居十六七乎？上自太史公、班孟坚，下至毕秋帆、赵瓯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数百。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而陈陈相因，一邱之路，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⑨

这是批评中国史学的不能创新，陈陈相因两千年，于是进一步

就批评中国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了。^⑩

汹汹之论盈天下，于是两千年以来中国史学所奠定的权威地位，大为动摇。模仿西方史学体例，采用西方史学方法，以撰写新的国史，变为近代中国史学界的风气。史学家勇于抛弃纪传、编年二体，而以西方的新纪事本末体作秉笔的极则，选题详述，溯其渊源，明其发展，而穷其究极；历史的背景、潮流、影响，皆不殚缕述；人物的传记，由简言直叙，而长篇巨制，曲折铺陈；考订史料，也不奢言乾嘉传统，而以德国的历史考证学为嚆矢。趋势如此，西方史学的威势可知。

正当西方史学风靡天下之时，西方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逆流而进入史学之中，掀起西方史学的最大危机。

后现代主义系对现代主义（modernism）的反动，不满现状，不服权威，勇于创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叛逆的思想之一。其初起约在1960年代末期，其涉及的范围，为建筑、艺术、哲学、文学、史学、政治、社会、法律等广大领域，其影响于史学较晚，然最严重^⑪。史学家忧心后现代主义最低限度将摧毁历史，甚至于整个历史事业（historical enterprise），为之荡然以尽^⑫。如他们认为在历史上没有真理（truth），没有客观（objectivity），没有真实（reality），历史是推论（discourse），意识形态的化身，史学家的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与文学作品的虚构没有两样，这是极为惊人的议论；从文献（texts）中他们也不认为有故事（story）能叙述出来；历史上更没有所谓连贯（continuity）、和谐（coherence）、一致（consistency）；史学家所盛倡的移情（empathy）、想象（imagination），设身处地地进入历史之中，他们同样认为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他们尤其坚持历史对现代及未来没有任何功用^⑬。持论如此，于是有人宣布历史

已经死亡，有人倡言历史已经烟消雾释，有人高呼历史已经到了尽头。这真是摧毁历史的骇人之论了！人类历史，遭遇到最大的挑战，西方史学，遂陷于危机重重之中！

西方发展两千余年的史学，值最盛之时，而出现最大的危机，是人类史学史上令人震惊的大事。中国史学，两千余年盛况不衰，而从未出现类似危机，东西情况不同如此，文化背景的差异，史学内容的分歧，都是因素。所以中西文化与史学的比较，是今后学术研究的新猷。拙著拟从中西史学的比较，探寻史学的真理，冀望有裨于世界史学的建立。蚍蜉撼树，自知力微，惟幸海内外垂教焉。

① Sophocles, *Antigone*, II, pp. 332 - 333.

② 《柳河东集·封建论》。

③ 《孟子·滕文公上》云：“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尧的时代如此，洪荒时代可知。

④ 《孟子·滕文公下》。

⑤ 参见 Herbert Butterfield, “Universal History and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ivilization”, in Sir Herbert Butterfield, Cho-Yun Hsu & William H. McNeill, eds., *On Chinese and World History*, 1971, p. 20.

⑥ 沈刚伯师于《古代中西史学的异同》一文云：“古代的民族，像埃及、苏美尔、巴比伦、亚述、希伯来与波斯等，他们统统留下了各种不少的文字记录；但这些都只是他们的历史记录，而不能说是他们的史学。在古代，有史学的只有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希腊。”（收入《沈刚伯先生文集》，原载《征信新闻》1964年10月12日。）

Herbert Butterfield 于《历史的起源》（*The Origins of History*）一书中云：“有些国家和文化，印度尤其是其中重要者，以前未有我们今天所谓的史学。”（*The Origins of History*, 1981, p. 208.）

⑦ 详见朱云影《中国史学对于日韩越的影响》一文（载于《大陆杂志》第二

十四卷第九、十、十一期，1962年5至6月)。

⑧ 《湘学新报》第三十期。

⑨ 《新史学》，载于《饮冰室文集》第四册。

⑩ 同上。

⑪ Beverley Southgate, *History: What and Why?* Routledge, 1996, p. 7.

⑫ Keith Jenkins, ed.,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Routledge, 1997, p. 8.

⑬ 后现代主义者如 Diane Elam, Jain Chambers, Roland Barthes, Keith Jenkins, Gabrielle Spiegel, Hans Kellner, Michel Foucault, Hayden White, F. R. Ankersmit, Jean Baudrillard 等都有类似的言论，详见拙文《后现代主义的吊诡》(原载《汉学研究通讯》总八十一期，收入拙著《变动世界中的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0-81页)。

第二章 西方对中国史学的认识

中西史学各自独立发展两千余年，不通声息。自 19 世纪末叶起，百年之间，双方开始交流，而认识未至透彻阶段。中西史学的原野，像是千古荆棘之林，惟待对方披荆斩棘的史学勇士，开辟经营，以启史学宏业。

坚持撰写世界史（universal history）的德国大史学家兰克于 19 世纪末批评中国史学云：

“中国有冗长的编年历史（lengthy chronology），但充其量只是一部自然历史（natural history），而非真历史。”^①

兰克恍惚中认识了中国有冗长的编年历史，但是由于他认为中国历史缺乏变化，而与欧洲的历史不同^②，所以他的一部世界史，就将中国摒绝于万里之外了（也以同样的理由，摒绝了印度）。

兰克以后，西方杰出的史学家辈出，认识中国史学而施以批评议论者，则如凤毛麟角。1942 年美国史学家汤普森（J. W. Thompson）出版其大著《历史著作史》（*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时，似乎尚不甚清楚中国有史学著作^③。直到 1960 年英国史学家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猛力批评中国史学以后，十

年之间，西方批评中国史学的言论，如风起云涌，形成了罕见的现象。

巴特菲尔德以研究史学史理论及探讨历史起源而驰名。他于1960年第一次公开批评中国史学云：

“虽然我们常常自我提醒，西方文化独能发展自然科学，可是我们每每忽略西方文化同样地以富有历史观念（historical mindedness），而卓然与世不同。古代的中国，科学工艺甚发达，历史著作极丰富，但是未臻于相当于西方17世纪科学革命与18世纪末19世纪初史学运动（the historical movement of the late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ies）的境界（亦未有若何迹象将能臻此境界）。”^④

1961年巴氏在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讲《历史与人类对过去的态度》（*History and Man's Attitude to the Past*），又对中国史学大肆批评。同年9月21日将讲词简化，在英国广播公司广播，《听众》（*Listener*）杂志刊其全文，其要如下：

“我相信没有任何文化，比西欧1450年到1850年间的文化，更富历史观念。”^⑤

“很多早期的编年史（annals），并非源于恢复既往的动机，仅欲为君王留不朽于将来而已。在美索不达米亚蔚成一趋势，凡阐释百事，皆追寻其渊源，此实变为历史写作的强有力的原动力，所以在巴比伦引导出宇宙创造的故事、洪水的故事及巴比伦塔的故事出来了。在西方世界及东方，历史多归功于掌管

历法的官吏。此类官吏，皆记录意义重大事件的日期。在东方，历史特别有赖于一类秘书，他们掌管纯为商业性质的记录，最初一点也不是为了绵延历史。”^⑥

“如果东方学者能从西方史学获得启示，那么西方学者非到他了解了东方将永不能领悟到重要问题的深奥处。一旦我们试着超越我们自己的思想界，等量齐观地看中西两大史学系统，主要的分歧，便暴露无遗。此两文化对历史与传统皆有其可怕的成见；两者历史精神太不相同，两者思想系统（太不相同的系统）太复杂。”^⑦

“从公元前2世纪起，中国即有考据学（textual criticism）的产生。……惟此一考据学的发展，未能到达一较高境界，不配我们称之为批评。换言之，即为未能对证据作科学的评价与分析。其中原因之一，为中国的特殊修史制度，这是中国史学与世不同的主要原因之一，已有人作过重要的研究。

决定性的因素，在于中国的修史太为一种官方事业了，大为官僚化的组织了。历史被视为统治者的有效辅导，大体上历史亦由官吏而写，为官吏而写。中国历史太有特征被称之为资治历史（civil service history）了。

在中国史学后面，有一假想，即凡属历史记载（historical record），皆完全客观。客观被认为仅仅将事实登录上（registering the facts）即可获得。避免涉及史实互相衔接（the interconnectedness of events）的问题，甚至避免描述背景或追问原因；避免谈论历史发展的整个观念，甚至连世界的渐变也不去叙述了。客观事实（the objective facts）一旦被他们列入记载，即有其独立性，所有未来史学家所必须做的，是重复既已确定的叙述，或者或许从既已确定的叙述中去自己选取。”^⑧